

Native Place , City ,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 1853-1937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上海史研究译丛

[美] 顾德曼(Bryna Goodman)/著 宋钻友/译 周育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家乡、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The Series of Translation concerning Shanghai History

[美] 顾德曼(Bryna Goodman)/著 宋钻友/译 周育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家乡、城市和国家

——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

K295.1
GD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1853—
1937/(美)顾德曼著;宋钻友译;周育民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2

(上海史研究译丛)

ISBN 7-5325-3603-3

I.家... II.①顾...②宋...③周... III.社会团体-
研究-上海市—1853~1937 IV.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5675 号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 1995,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书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译出

上海史研究译丛

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

[美]顾德曼 著

宋钻友 译

周育民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5 $\frac{6}{18}$ 插页 5 字数 283,000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

ISBN 7-5325-3603-3

K·541 定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813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 - 研究院规划项目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城市研究”重点学科项目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顾问:

张仲礼 陈 绛 魏斐德(美)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军	马学强	卢汉超(美)	叶文心(美)
叶凯蒂(德)	毕可思(英)	安克强(法)	张晓敏*
周 武	周育民	高纲博文(日)	梁元生(香港)
熊月之*	黎志刚(澳)		

有*者为执行编委

执行编辑: 张晓敏 吕 健

本书责任编辑: 李志茗

美术编辑: 黄 琛

技术编辑: 富 强

上海这座城市，既饱经沧桑，给人以复杂的历史感，又生机勃勃，给人以常新的时代感。用得着一句老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上海史研究，历来备受学术界关注，海外学者更是情有独钟。即使不算一百五十年前麦都思对上海历史的简单描述，也不算稍后麦克莱伦的《上海史话》、裘昔司的《历史上的上海》，单从 1921 年、1923 年寓沪英国学者兰宁、库寿龄共同推出的功力深厚的两大卷《上海史》算起，海外学者对上海史的研究已有 80 个年头了。尤其最近二十多年，海外上海史研究更明显呈现“四多”，即项目多、会议多、成果多、人才多。在美国，西部伯克利、洛杉矶、俄勒冈，东部康乃尔、哈佛，北部密西根，都各有学者在研究上海史。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我国的香港、台湾，也都有学者在从事上海史研究。日本有上海史研究会之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因研究上海史人多势众，在美国学术界曾有“上海帮”之谑称。

上海史已是海外汉学界公认的热门话题，堪称显学。

海外学者究竟发表过多少关于上海史的著作，难以确计。据不完全统计，自 1980 年代以来，美、德、法、英、日等国关于上海史的博士论文已有不下三百篇，正式出版的上海史著作不下五十部。

上海史是内蕴极丰的富矿，开采眼光、冶炼技巧因人而异，其产品自然也多姿多彩。有的对社会史、文化史感兴趣，有的对政治史、经济史感兴趣；有的纵贯古今，有的横跨多门；有的以资料翔实著称，有的以议论充当见长。他们共同构成上海史园地的繁盛景观。

上海史早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翻译海外上海史研究成果是上海史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城市史、近代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学科建设也有积极意义。《上海史研究译丛》遂应时推出。

本丛书所选各书，是我们接触到的优秀著作中的一部分。还有一些书颇具价值，但或因已有中文译本，或因翻译版权联系未妥，未能列入。遗珠之憾，尚望鉴谅！

本丛书编委会成员除了上海的学者，还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的学者，他们都是上海史研究专家。在《译丛》组织出版的过程中，他们帮助推荐作品、联系版权、校订译文，付出了很多劳动。

本丛书具体翻译工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组织。

张仲礼、陈绛、魏斐德(美)三位著名学者多年从事上海史研究，欣然担任《译丛》顾问，帮助规划全局、解决疑难问题，使丛书增色不少。编委会特此表示感谢。

《上海史研究译丛》编委会

中文版自序

《家乡、城市和国家》中文译本的问世,令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类专著的翻译和出版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理解,也将促进世界各地学者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本书课题的研究始于我在复旦大学当博士生期间。20世纪80年代,我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来到上海,以一个留学生的身份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三年美好的时光。我非常感激我的两位导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黄美真教授和杨立强教授——对我的帮助。他们不仅引导我从事上海历史的研究工作,而且帮助我使用从上海图书馆、上海历史博物馆尤其是上海市档案馆收集到的重要的历史资料。那时候,这些机构刚刚开始向国外学者开放。我在上海期间所做的研究工作为我1990年在斯坦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奠定了扎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中国历史档案资料的进一步开放,我又先后几次到上海,为本书的出版收集新材料。在这期间,我的很多中国同事友善地给我提供了他们的见解和知识,并对我的资料收集工作予以协助。我借此机会感谢上海市档案馆的马长林先生、黄妙真和马晶华女士及史梅定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熊月之、徐鼎新、宋钜友先生和罗苏文女士以及其他人士,上海历史博物馆的潘君祥和钱宗灏先生,以及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另外,我对张济顺、赵小建和姚平女士的帮助和建议也表示感谢。

记得最初在上海开始我的研究时,很少有人对会馆、公所或同乡会的研究发生兴趣。上海博物馆的杜黎先生是个例外,他那时就已经作过这方面

的专题研究。杜先生的研究成果以及我们的几次面谈对我很有启发。那时候,很多学者认为同乡概念和同乡会只与传统中国社会有关。尽管我也认识到晚清时期同乡会的功能,但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同乡组织在 20 世纪的持续和演变。对于这些所谓“传统”的组织的活动力及它们在现代社会转化的理解,使我对历史学家们关于“传统”和“现代性”所经常做出的预设进行反思。在为这些所谓“传统”思想和机构所拥有的活力及其现代转化提供经验性证明的同时,本书也为同乡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形成中的作用问题提供了根据。我希望这本译著有助于激发对于这些概念的进一步讨论。

作为一个在美国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我深知翻译工作之艰辛和重要。我十分感谢宋钻友先生对此书的翻译所付出的心血和宝贵时间。本书的翻译出自一个对于上海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之手,这对于原作者本人以及中国读者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2003 年 5 月

鸣 谢

本书出版之际，谨向我的导师斯坦福大学的哈罗德·卡恩(Harold Kahn)和莱曼·范斯莱基(Lyman Van Slyke)教授，致以最真挚的谢忱。在他们的指导下，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们细心披阅我的论文稿，提出了不少富有真知灼见的修改意见，督促并激励我完成了大量修订工作。他们在斯坦福建立了一种少有的团结合作、探求知识的氛围，具有很高的教学、学术和道德水准。

卡罗兰·本尼迪克特(Carol Benedict)、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周锡瑞(Joseph Esherick)、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蓝温蒂(Wendy Larson)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审阅了我的全部论文稿，对一些细节的修改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引起我作进一步思索，从而大大丰富了本书的内涵。在我最初设计整个研究框架时，曼素恩(Susan Mann)给了我及时的指导，她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很有深意的建议。我在伯克莱加州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和叶文心(Yeh Wen-hsin)那儿获益良多，他们认真阅读了我的论文，以他们对上海史和与本课题相关的深邃研究问难答疑，作出具体点评。包筠雅(Cynthia Brokaw)、安德鲁·查尔(Andrew Char)、康豹(Paul Katz)、罗威廉(William Rowe)和恩斯特·施维策(Ernst Schwintzer)每人都阅读了部分我的论文稿，提出了富有才智的评论和建议。对于上述每一位阅读过我稿子的师友，我都怀有感激之情，他们的帮助，使我避免了初稿中的一些瑕疵。

我在中国的最初研究，得到我的导师——复旦大学黄美真、杨立强教授

的很多帮助。他们曾邀请我到府上做客,向我介绍他们家乡福建和广东独特的菜肴、点心。1991年上海研究中心的张济顺、朱弘和黄美真教授一起,为我的一次旅行研究作了精心安排。提供帮助的还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外事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也同样感谢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和上海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一些不易理解的文献,范毅军、姚平和赵小建花了不少时间为我解释。傅葆石、滨下武志、罗苏文、特德·胡德尔斯(Ted Hutters)、华志建(Jeff Wasserstrom)则在资料的搜寻上为我指点迷津。我在东京做研究工作时,高彦颐(Dorothy Ko)热情接待了我,为我在东京的访问、研究安排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俄勒冈大学历史系对我的工作一贯给以鼓励,使我能更加专注地进行本书的修改工作。

汤姆·戈尔德(Tom Gold)和中国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我在1990—1991年博士后期间的写作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对1988年上海史国际研讨会以及上海研究中心随后两次学术会议组织者的盛情邀请,我也表示谢意,他们的邀请使我有机会与中国的同行讨论我的研究心得,从中获益。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俄勒冈大学,为我参加这些会议提供了经费资助。对安克强和里昂东亚学院工作人员,我怀有一份感激,1993年秋季,他们热情接待了我,为本书的最后修改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知识氛围。

我在中国的研究得到美中学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批准,由美国政府教育部提供资助,这使我有可能从事研究和写作。俄勒冈大学的人类学理事会和里德学院 Vollum 奖也向我提供过资助,他们的关爱,使我的研究和写作得以延续。对加州大学出版社的朋友我愿意在这里一并致谢:希拉·莱文(Sheila Levine)对本书出版给予的支持和表现出的兴趣,劳拉·德留西(Laura Driussi)在编辑方面的耐心帮助,萨拉·K. 迈尔斯(Sarah K. Myers)对论文稿极其细心的审读,都让我不能忘怀。好友杰夫(Jeff)和罗斯玛丽·奥斯勒(Rosemarie Ostler)在最后阶段为定稿费心不少。自然,我还得向夫君彼得·埃德贝格(Peter Edberg)道谢,感谢他在编辑和电脑方面给予的帮助,还有其他许多无法在这里一一叙说的琐事。

目 录

中文版自序.....	1
鸣谢.....	1
第一章 引言	
——爱群之美德.....	1
家乡观念.....	3
上海的地缘区分：城市生活的表层.....	8
同乡组织与行业组织.....	17
中国人团体的名称.....	21
第二章 外国帝国主义、移民和骚乱	
——鸦片战争以后与 1853 年小刀会起义.....	34
鸦片战争前的上海移民.....	35
上海作为条约口岸开埠.....	36
上海的广东帮：个案研究.....	38
麻烦来了：劳工、流浪汉和水手.....	42
鸦片贸易：体面与罪孽的桥梁.....	45
摆脱控制和夺取城市：小刀会起义.....	47
第三章 团体、等级和权威	
——精英和非精英在晚清同乡文化中的作用.....	62
会馆事务和会馆寡头.....	62
以人为本.....	65

仁义和声誉	75
第四章 事务的扩大	
——慈善救济、现代企业、城市与国家	88
管理事务	89
参与新技术和制度改革进程	98
经济民族主义、现代企业和普世主义	101
第五章 同乡会、外国当局与早期大众民族主义	110
外国依靠会馆维持租界秩序	111
政治冲突：宁波墓地风波	116
早期民族主义与阶级间紧张关系的发展	122
第六章 同乡与民族	
——反帝与共和革命动员	131
清末的反帝动员	132
同乡组织和革命动员	141
第七章 “现代精神”：制度变迁与军阀政府的影响	
——民国初期的团体	161
“现代精神”和同乡团体的重建与繁荣	162
民国初期同乡会的负担和事务	173
第八章 家乡与国家	
——民族主义、国家建设和民众行动	191
新文化、旧习性：同乡组织与五四运动	192
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间的同乡团体	202
公共行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同乡团体	210
第九章 结论	
——文化、现代性和国家认同的资源	225
附录一	
公共租界人口籍贯构成统计(1910—1935)	232
1929 年上海华界人口籍贯构成统计	232
附录二	
参考文献	233
译后记	263
校后记	265

第一章

引言

——爱群之美德

上海五方杂处，侨寓之民实多于土著。故各处之旅沪者，皆以会馆以通声气。宁波人最多，所立者为四明公所；粤人次之，所立者为广肇山庄、潮惠会馆；他若湖南、楚北、泉漳、浙绍、锡金、江宁、江西等处，各有会馆。此外未设会馆之处，每月召开同乡会者，亦联络乡情之意也。吾国之人未尝无爱群之心，即以本邑而论，同乡之人既各设会馆，而同业之人亦各设公所……可知华人亦有爱群之美德也。

李维清《上海乡土志》，1907

您曾对我说，中国人出于共同情感，不会出来作[不利于同胞的证明]。你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国人从不受同胞情感的影响。街上，各地华民混杂，没有人关心他人的疾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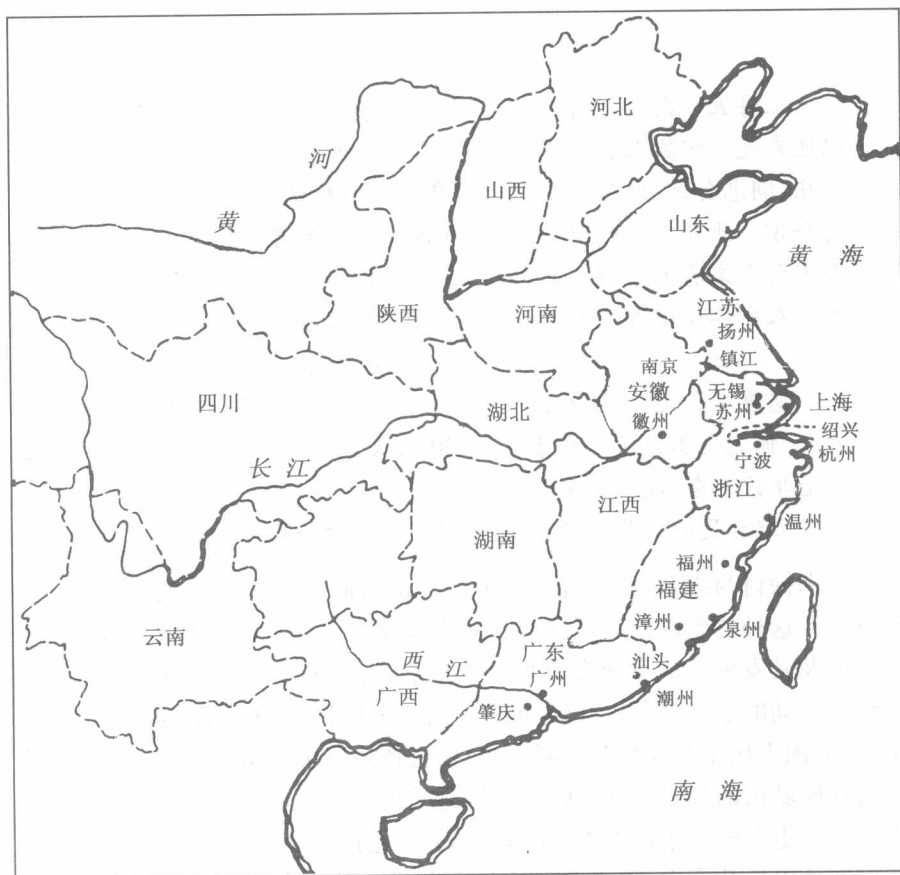
道台吴煦致英国领事(英国外交部文件, FO 228. 274, 1859)

本书探讨与维系所谓乡情、乡谊或梓谊的同乡人情感有关的社会活动和仪式。这种情感以及体现它的社会机构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近代都市社会的性质及其发展。本章开头的两段引文提示了与同乡情谊相关的都市社会组织与活动的孪生现象。1907年的《上海乡土志》阐述了面对都市的杂乱不安，中国人出于其天性和“美德”，自然会依乡缘关系组织起来。吴煦道台在对这座城市的叙述中，则认为“爱群之美德”可能是一种缺陷，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走在熙熙攘攘的街市时，他们并不会产生同为中国人的认同感。^①我们在这以后几章中，将主要谈论如下题目：引人注目的中国城市中的同乡情感与同乡会；同乡观念和社会组织对城市生活、社会秩序，对城市乃至

国家认同的影响。

这一研究以上海为主,时间上涵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即从 1843 年上海开埠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中国各地移民群体涌向上海贯穿了这一时期,城市人口迅速扩大,外来人口支配了上海。19 世纪上海人口增加了 4 倍(见地图 1)。1800 年上海人口在 25 万至 30 余万之间。到 1910 年,为 130 万,1927 年又增加了一倍,即 260 万。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移民至少占城市人口总数的 75%。一部分移民为寻找经济机会而来,另一些则为躲避家乡的战乱和饥谨。

为联合力量以应付其面临的新的都市环境,来自各地的移民组成了会馆、同乡会等地缘团体。这些组织以及产生它们的同乡观念是整个清末民



地图 1 移民上海的主要省份

初上海都市环境的构成要素。以地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制约着上海的发展。

同乡情感与组织之所以如此显著与持久,是由于其应付城市经济、社会和政治变迁压力时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实用性。同乡团体的数量及其形式和活动的变化,表明了它们坚韧和易变的特性。这使同乡情感成为理解这座城市近代变迁内涵的关键。

上海的同乡团体虽然相当突出,但不是孤例。中国的移民群体塑造甚至支配了这一时期所有扩展中的中国商业区域。^②移民本身没有将中国城市与欧洲、美国的城市区分开来。^③然而,同乡认同和同乡团体得到精心培植的程度,同乡情感和机构的牢固和力量,却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家乡观念

身份及与家乡的联系 在中文记载和文学里,表达本土概念的词汇相当丰富,诸如籍贯、桑梓、老家、原籍和故乡等。家乡在传统中国是个人身份的关键部分。陌生人相遇,照例先要问“老家在哪儿”。籍贯是某人姓名、字号以外第一个特征记录,在法律面前需要确认某人身份的首要事实。^④

对于希望在上海谋生的移民,同乡认同既表达了与掩埋祖先地方的精神联系,又表达了与家庭成员和社群的现实纽带关系。由于地缘群体帮助和资助同乡旅居者,并将之视为对群体的一种经济投资,这些联系最常见的是经济上的和情感上的。地缘群体的宗教和经济活动所依据的假设是,旅居者的身份没有因居住地的改变而改变,居住地的改变是暂时的,旅居者逢年过节会返回家乡,最后还要归葬家乡。这些信念并不因为移民在外居住了几代而改变。在“临时居住地”出生的移民子女并没有获得新的籍贯,而是继承其父辈乃至祖辈的籍贯。实际上,只要可能,移民就回乡结婚、奔丧、退养和归葬。^⑤漂泊在外时,他们长年寄钱回乡,用源源不断的汇款表达对家庭和家乡的忠诚。

这些信念和行为方式,使中国的都市移民被当作旅居者,并不涉及身份的根本改变。上海的移民群体或自称“旅沪宁波人”,或自称“寓沪广东人”等。这些名称即使承认为上海的旅居者,仍然强调同乡身份的基本特性。这些名称又提示了旅居者身份的混合性:当旅居者因上海和家乡发生联系时,他们既非纯粹归属于家乡,又不能仅仅采用居住地(上海)的身份。

对于每个旅居者而言,尽力保持与家乡的联系只是一种愿望,这种愿望要有金钱的保障。^⑥尽管如此,除了穷困潦倒者以外,其他人都试图定期地回到老家,即便离开家乡的时间已十分久远。其中也包括一些秘密结社和犯罪团伙的成员。1858年1月23日的《北华捷报》报导了浦东高桥一家当铺和富户遭到一个广东帮的抢劫,指出,值此广东人将要返乡过年之际,“不逞之徒乘机窃取钱财衣物,以为过年享用,而逃避惩处”。

叶落归根,归葬家乡是旅居者的最大愿望。中国的葬仪要求死者葬在家乡,在祠堂供奉牌位。这样,死者的灵魂才能享受家庭的舒适、晚辈的祭品和追思。^⑦然而,将旅榇平安运回故里的船费十分高昂,为免埋骨他乡,同乡团体对想扶榇回里而财力稍乏的同乡会予以帮助。对于无法归葬的同乡,同乡组织还置有墓地,其中不少棺槨系未定归葬与否而临时安葬的。此外,同乡团体还在上海建造临时停放棺槨的建筑(丙舍)。棺槨在丙舍一直停放到运回原籍。建造墓地和丙舍所需资金在同乡群体内募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旅行者经常在轮船上看到封得严严实实的棺槨,可见其对于家乡观念的奉行。大规模的棺槨临时寄放,与家乡墓地的联系、运输的协调、运棺费用的担保,是会馆长期而又重要的事务。^⑧

分离与痛苦 旅居者的行为,既发乎思乡之悠情,亦源自同乡人之关系。当迁徙的村民走出家乡,越走越远,从方言勉强还能听懂、口味勉强还能适应的邻县,最终到达一个语言陌生、口味难调的地方,攀同乡(同省人)、抒乡愁,成为他们对于离乡之苦的自然反应。

旅居者的乡愁往往成为文学作品的主题。具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几乎无人不晓李白的那首名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⑨

离开家乡的移民几乎没有不患思乡病的。他们相信身体和精神的痛苦源自背井离乡。因有人撰文进行中伤,笔名“荣阳甫”的广东香山人致函《申报》,为家乡同胞的诚实进行辩护。这封信以香山人文荟萃开头,以“香山黄文裕公、郑一岳公两家十八代书香”为证。至于声名狼藉的香山妓女,他争辩说,这是由于她们与家乡分离了,其品性很难说是真正的香山人了:“既谓广东婆、咸水妹均系香山一县之女,何以无一操香山之音?莫非至[自]幼为他县人拐骗,作此不类之事乎?抑入其乡食其水变其音而心亦变乎?”^⑩

对荣阳甫和他的读者来说,家乡的认同来自家乡的风土人情和袅袅乡

音。“橘逾淮为枳”，长吃他乡之食，难免有损乡音、乡情。因此，对旅居者而言，家乡认同不仅是出生地的缘故，更需要坚持不懈的精心呵护。

为在世者建立与家乡联系之重要性的表现形式，折射出了这种精神世界。实际上存在有两种会馆：一种是为生者服务的阳会馆，一种是为死者办事的阴会馆，即慰藉亡灵的同乡墓地和丙舍之类。^⑪

哪怕是神灵，据说离开故乡也会感到悲伤。在福建省外的城市的福建会馆中，都供奉着福建地方的女神天后，将之仪式性地与故土连结在一起。^⑫

旅居者同乡群体的组织 会馆是同乡人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聚集之地，是都市景观的标志，故而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由于它们具有同乡的标识，以各种活动把旅居者汇集起来，代表着不同同乡群体的“脸面”，因而对于旅居人口的明确的同乡观念和群体之构建起着关键作用。这种群体的发展依靠其在城市中的财力资源和影响网络，这种资源促进了将旅居者中贫困者和精英人物联结起来的资助机制的发展。在上海，那些没有足够手段建立同乡组织的群体，对同乡人的认同感也较少，家乡观念也不那么浓。

旅居者在异地他乡建立会馆，以营造一种可以依托的家乡氛围，同时也作为这些旅居者群体重要性的表征。^⑬正式的同乡组织发端于为旅居者建造同乡的神庙、墓地和丙舍。通过在世旅居者在宗教生活和重大节庆场合的联系，同乡组织在异地他乡长期保持着同乡的联系和情感，致力于商业的组织、同乡商业或贸易利益的维护。在移民带进城里的家乡口音和行为方式这些可称之为同乡情感“素材”的组合中，这些组织起了规范化的作用，并进一步使之成为都市同乡群体的表征。

旅居者群体的同乡情感与组织颇似一个大的血缘组织。在一个城市中，旅居者的亲戚数量不多，难以形成气候。同乡关系则涵盖了一个很大的群体，包括亲属关系。^⑭会馆董事通过礼拜已故会馆董事的制度，有意识地强化其组织以及组织的世代谱系。这些已故董事的牌位（先董神位）即起着会馆祖先牌位的作用。^⑮

虽然社会上的大多数旅居者都被接纳到同乡团体中，但只有拥有足够财力的群体才能建造宽敞的房屋和墓地，以体现同乡团体的实力。在每一个城市中，同乡依其群体的规模和地位而重组。如果某省的旅居者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他们会形成若干府级甚至县级的团体。但如果某省